

政府能力与大国崛起

——评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

周陶沫

内容提要 近年来,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现实主义理论阵营中最活跃的理论分支。本文评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扎卡利亚的《从权力到财富》一书,对书中提出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研究问题、因果链条和经验检验等主要研究环节进行了归纳和梳理。文章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总结了扎卡利亚的研究的成就与缺失,认为该书通过揭示政府能力这一核心变量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将国内政治因素纳入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建构中,对于理解新兴大国的成长具有借鉴意义。此外,作者也对扎卡利亚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进行了批评。

关键词 财富 权力 政府能力 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大国崛起的内在机理和制约因素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核心话题。富国能否蜕变为强国?国家实力如何成功地转化为海外影响力?这些经典命题似乎比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历史更加久远。在《从财富到权力》

《国际政治科学》2008/3(总第15期),第115—128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美国世界地位不同寻常的起源》一书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新秀学者、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法利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便试图对这些古老的问题给出一种新颖的视角,他所提出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被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誉为近年来外交政策理论中最重要的创新成果和社会科学定性分析的上乘之作。

《从财富到权力》探讨了国家与政府、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张力,揭示了作者眼中强国崛起的内在机理以及大国行动的必然规律。不论是史论结合、个案研究的方法,还是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意义,该书都能够为我们提供不少有价值的启发。同时,扎卡利亚对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挑战、批评、修正以及补充,虽然不尽完善,却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了解国际关系领域现实主义流派内部诸多分支的发展谱系。鉴于国内学术界对这本书的系统评介并不多见,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本书的逻辑框架、历史脉络以及围绕本书的一些理论争论加以梳理。

一、扎卡利亚的学术背景

法利德·扎卡利亚 1964年出生于印度,少年时代便留学美国,先后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扎卡利亚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国际关系学者,还是颇具影响力的记者、专栏作家、杂志主编和时事评论家。他于 1993年成为《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历史上最年轻的执行主编,2000年起出任《新闻周刊》(*The New Yorker*)的国际版总编和专栏主笔。

扎卡利亚分别于 2003年和 2008年出版的《自由的未来:论国内外缺乏自

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孙英春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由于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参考了中英文两个版本,部分引文来自英文原文,部分源自中译本。

参见本书英文版封底。

有关这本书的中文评介可参见杨向峰:《从富国到强国的蜕变:扎卡利亚 从财富到权力 介评》,《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 6期,第 84页。

期间扎卡利亚参与编辑了《美国的际遇: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James F. Hoge and Fareed Zakaria, eds., *The American Encoun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ssays from 75 Years of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由的民主体制》和《后美国世界》都在外交政策的公众舆论导向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自由的未来》一书探讨了比较政治学一个永恒的话题,即什么变量在怎样的条件下促成了自由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延续。该书认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化的政策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因为一个稳定的社会首先需要的是政治权威,有了政治权威,社会才有秩序,才能够积累扩大民主参与所必需的经济基础,才能够发展维持民主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制度要素。新近出版的《后美国世界》一书则体现了扎卡利亚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影响力从内到外的反思。扎卡利亚在书中强调,美国社会目前应当关注的不是别国的崛起或自身的衰退,而是在过去10年里导致国内政治矛盾丛生、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党派政治。

作为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从财富到权力》被收入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历史与政治丛书”之中,在当时的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凭借此书,扎卡利亚的理论创新能力以及对历史材料的组织能力也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从财富到权力》称得上是扎卡利亚将自身知识储备转化为在学界、媒体乃至外交决策层的影响力的坚实基础。

二、《从财富到权力》的主要内容

《从财富到权力》全书共计六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提出本书研究的问题,并概述作者的主要论点;第二章讨论了解释国家扩张的两种理论,即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三、四、五章按照时间顺序分析了美国在1865年—1889年和1889年—1908年两个时间段里对外扩张政治利益的程度和国内政府力量的变化,从而对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进行了验证;最后一章是作者对本书核心观点的归纳,对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局限性的反思,以及对理论现实意义的探讨。扎卡利亚的研究严格按照政治科学方法论的要求设计,本文也遵循这一模式,从问题意识、理论假设、案例验证等三个方面总结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本书的主要内容。

(一) 问题意识

《从财富到权力》一书试图回答的是一个在国际关系领域具有永恒现实意义和重要理论价值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一国会在境外扩展其政治利益?具体而言,富国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会将财富转化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庞大的军事存在?在这里,扎卡利亚对因变量“扩张”的定义并没有局限于拓展疆界,而是将“扩张”宽泛地定义为“从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到外交使团的增加,再到参与大国外交等不同程度的积极对外政策。”扎卡利亚把这个宏大的命题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在1865到1889年之间,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美国为什么没有把财富转化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这一阶段内美国的领土扩张有限,军事力量与其他大国相比微不足道,并且回避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外交角色。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889年到1908年之间,美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战略并迅速扩张其海外利益。这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

(二) 理论假设

根据扎卡利亚的总结,目前存在两种理论能够为1865年到1908年之间美国的扩张不足与迅速扩张提供解释,分别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依照扎卡利亚的解读,防御性现实主义主张国家追求安全而非利益,国家扩张的主要动因是外部威胁。也就是说,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国家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向外扩张其政治利益。总的来说,扎卡利亚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在历史面前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依照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逻辑,既然国际体系中安全是充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应当追求最小化的对外政策,而历史上数不尽的大国崛起、大国争霸的案例都会被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视为例外。另外,扎卡利亚也质疑“威胁”这一概念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威胁”经常被有野心的政客用作煽动民众支持国家对外侵略的借口,因此社会科学家在从历史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 8.

Ibid., p. 5.

资料中寻找素材时很难辨别一国的国家安全是否真正受到了威胁。具体到本书所探讨的个案,扎卡利亚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虽然貌似能够以美洲大陆独特的安全环境解释 1865年到 1889年之间美国的扩张不足,但却不能够解释 1889年到 1908年之间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型。

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相对的是扎卡利亚构建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虽然扎卡利亚将该理论视为对古典现实主义的修正,扎卡利亚本人也因此经常被分到“新古典现实主义”流派中,但也有学者认为从其保留的基本假设来看,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更像是结构现实主义的补充和发展。这种判断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质是决定国家行为的根本因素。扎卡利亚在书中写道:“在无政府、没有等级划分的国际环境中,体系的现状驱使国家参与竞争:如果一国不做任何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尝试,那么扩张的机会就会落入别国手中。”其次,该理论也承认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其对外扩张可能性的决定意义远远大于政体形式等其他国内层次的因素。也就是说,该理论认为国家行为是对系统刺激的一种理性反应,由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所决定。上述两个论点更接近沃尔兹(Kenneth N.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与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等古典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对权力的追逐根植于人性本身的观点相悖。因此,虽然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关注诸如政府能力、决策者对国家实力的认知等中间变量,使其不能被视为纯粹的结构现实主义,但结构现实主义依然可以说是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逻辑推理的起点和必要前提。

在保留结构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扎卡利亚对已有理论做了以下三方面的修正及补充。首先,扎卡利亚在结构现实主义的因果链条上添加了“政府能力”这一干扰变量,主张政府结构会限制国家力量可使用的程度。扎卡利

参见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4—172。也有学者将本书归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参见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3, 1998, pp. 157—128;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 128。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p. 161.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 29.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p. 162.

亚将分析的单元从国家 (nation) 转移到政府 (state), 因为他认为“政治家而非国家, 是国际事务的基本行为体, ”而“政治家只能通过政府结构才能利用国家的权力资源。……外交政策是政府权力的产物”。由此, 扎卡利亚实现了国家与政府的区分, 并得出推论: 当决策者制定外交政策时, 起关键作用的不仅仅是国家的经济实力, 还包括政府有多大的权威和动员能力把物质财富投入到实现对外战略这一目标中去。扎卡利亚把强大政府的特质定义为团结、自治、富有和责任范畴最大化; 弱小政府的特质则定义为分散、社会渗透、贫穷和责任范畴最小化。其次, 扎卡利亚抛弃了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追求权力和资源最大化的假设, 并以国家追求影响力最大化的假设取而代之。具体而言, 追求影响力最大化的国家试图增加其对他国和自身周围环境的控制力。在这一过程中, 国家实力是手段, 而影响力是国家追求的目标。由此, 扎卡利亚实现了权力与影响力的区分, 从而避免了古典现实主义中“权力”作为目的和手段同时出现的混乱。第三, 扎卡利亚超越了现实主义纯物质的视角。他认为, 在对外政策的形成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主观意义上决策者对本国实力的认知, 而不是客观意义上对国家实力的精确计算。

经过上述技术性处理, 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因果链条被扎卡利亚分别简化为:

防御型现实主义: 当核心决策者意识到威胁的增长时, 国家就试图对外扩张其政治利益。

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 当核心决策者意识到政府力量的相对增长时, 国家就试图对外扩张其政治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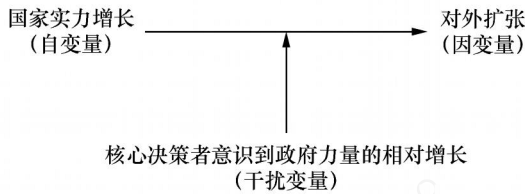
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因果链条如下图所示:

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 60页。

同上书,第 56页。

Randall Schweller, "Review: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No 2, 1999, pp. 497—499.

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 60页。



(三) 案例验证

理论本身不能被绝对地证实或者证伪,因此扎卡利亚将上述两种理论设为两个平行的“实验组”,放置在1865年到1908年之间美国扩张与扩张不足的54个案例中,以此检验两种理论的相对有效性。为了使因变量可操作化,扎卡利亚把“扩张”的判断标准设定为领土拓展。从1865年到1889年,在22次拓展疆界的机会当中,美国仅仅抓住了6次;在这22个案例当中,防御性现实主义可以解释2个,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能够解释15个。从1889年到1908年,面对32次扩张机会,美国成功实现了25次领土拓展;在这32个案例中,防御性现实主义可以解释6个,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能够解释22个。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段,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解释成功率分别为9%和19%,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则为68%和69%。

扎卡利亚从以上数据得出结论:政府力量的增强而非威胁的相对增长,以及核心决策者对此的认知,是美国从扩张不足走向积极扩张的主要原因。扎卡利亚在书中对19世纪下半叶美国政府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作了详实的分析。南北战争后,几届总统和国务卿曾多次试图将美国与日俱增的国家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但鲜有成功。扎卡利亚认为美国自建国以来重视分权制衡的传统导致了美国中央权威的弱化,而立法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力量。但是,管理规模日益庞大的国民经济的需要和文官机构的改革逐渐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白宫通过行使否决权、任用亲总统的官员等方式确立了总统的优先权。随着近代总统制的诞生,美国逐渐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完成了从富国到强国的蜕变。狭义上讲,工业化而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p. 183—184.

杨向峰:《从富国到强国的蜕变: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介评》,第84页。

非外部安全威胁促成了美国外交战略的转型;广义上说,国家的行政权力与外交政策的扩张倾向成共生关系。究其本源,是国家实力塑造了一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对威胁的感知。扎卡利亚在书中做过这样的比较,美国曾经面临过四次一国试图主宰欧洲的情形:拿破仑战争给华盛顿总统带来的只是些许不安;威廉二世的野心也没能引起美国的热切关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三年美国才迟迟出兵);相对而言,纳粹德国的侵略企图迅速得到了美国的重视;而面对苏联,美国则发展出一整套政治、经济及军事战略与其对抗。这一变化曲线再次证明了现实主义“能力塑造意图”的原则。扎卡利亚在本书结论中强调:大国追求的不仅仅是安全,而是国际影响力,且一国领导层与国民对其国际影响力的预期是与其经济实力同比增长的。

三、《从财富到权力》的贡献与缺失

(一) 本书的贡献

纵观全书,扎卡利亚提出并试图验证的核心逻辑在于,政府的力量是对新兴国家崛起的强大制约因素。政府型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与作者成书之时直至现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紧密相连的:统一后的德国会不会对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会不会使其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中国又是否可能实现“和平崛起”。本书虽然着重指出国际体系中的新富国将财富转化为权力的必然性,然而扎卡利亚认为其理论对未来的预测并没有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所描述的那样悲观。依照政府型现实主义的逻辑,政府的力量对新兴国家崛起构成了强有力的制约。德国中央政府的权威面临其下自主性日渐增长的联邦各州政府和其上职能逐步增加的欧盟组织的双重削弱;日本一方面被其战后的和平宪法所束缚,另一方面也受国际环境的约束;中国的中央政府在面临地方权力机构挑战的同时,也被国际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p. 186—18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体系所限制。因此,“由于长期没有发生强国间的战争,全球经济增长已经削弱了政府,并将政府约束在结构之中,在这些结构中,以前简明的大国兴衰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充满摩擦的过程。”

从研究路径来看,《从财富到权力》一书强调国内政治这一单元层次变量的重要性,从而丰富并修正了现实主义理论。扎卡利亚在该书的开篇就强调,他所要建构的是一个与国际政治理论不同的“外交政策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寻求对国际社会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加以解释。肯尼思·沃尔兹发现了国家之间冲突与力量均势的永恒性,并创立了结构现实主义。出于理论简约的需要,国际政治理论对国家的动机作了单一化的假设。相对而言,外交政策理论则说明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或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外部世界的意图、目标和倾向各不相同。沃尔兹将国家假设为质地均一的原子,而扎卡利亚则假设国家是用不同材料做成的撞球(billiard ball),不同的材质决定了每个撞球有自己独特的运动速度和旋转频率。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本书的意义在以下两点:首先,扎卡利亚在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设计规则的前提下,灵活地将历史和理论、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相结合。其次,此项研究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扎卡利亚把1865—1908年间美国扩张行为这一个案例分解成54次扩张和扩张不足的个案,而且这些个案中和理论相关的变量都可以被准确定位。原本按照社会科学的原则,单个案例对理论的检验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但是经过扎卡利亚的上述处理,单个案例也可以在较大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p. 191—192.

Michael Lind, “The Catalytic St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27, 1992, pp. 3—13; Michael C. Desch, “War and Strong States, Peace and Weak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2, 1996, pp. 237—68. Quoted from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 192.

与该书一样将国内层次分析引入国际问题研究视角的代表著作有: Stephen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eter J.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其中斯奈德的《帝国的迷思》对该书的影响较大,许多观点都源自扎卡利亚对《帝国的迷思》的评论文章,参见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1992, pp. 177—189。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 34.

范围内测试理论。

从国际政治领域知识积累的角度来看,扎卡利亚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批判纵然不能令该流派中的学者们完全信服,但由此引发的争论对现实主义理论群的整体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个层次上,该书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应当进一步明晰“权力”和“安全”两个核心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系,两者分别作为自变量时在怎样的情况下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国家行为。

(二) 本书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理论上,《从权力到财富》是近年来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在方法上,则是社会科学定性分析的佳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者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批判和对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本身都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

首先,扎卡利亚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批判存在以下几方面不妥之处。最突出的一点是,本书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修正似乎歪曲了其真正内涵。如前文提到的,扎卡利亚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强调威胁和不安安全感是决定国家行为的关键因素,因而这一理论忽视了国家实力对国家意图的塑造。值得一提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的确多用“威胁”来解释联盟的形成、战争的起源等现象,但是并没有将对“威胁”的应用扩展到富国在一般意义上寻求海外影响等问题上。也就是说,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像扎卡利亚所说的那样把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大国崛起、大国争霸统统归为特例。扎卡利亚“能力塑造意图”的观点其实也被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者所认可。如斯奈德在《帝国的迷思》中就认为,在一定范围内的帝国扩张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强国征服弱国是有利可图的。而斯奈德提出的问题不是大国为什么扩张,而是大国为什么在收益远远小于成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据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 1971, pp. 682—693.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p. 181.

亨廷顿对本书的评价,转引自门洪华:《从财富到权力》的“译后记”,第 292页。

本的情况下依然过度扩张。另外,扎卡利亚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很难确认并量化其核心变量——威胁。然而,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自变量——决策者所感知到的“国家实力”和干扰变量——决策者所感知到的“政府的强弱”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更何况多数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者并没有像扎卡利亚所指责的那样把对威胁的判断建立在政治家的煽动性言论之上,如斯奈德在《帝国的迷思》中就充分意识到一些政客和官僚机构内部的利益集团对外部威胁的恶意宣传和夸大。

此外,扎卡利亚所选择的案例对两种理论的检验也不尽公允。扎卡利亚在开篇写道,因为美国显而易见的安全处境,1865—1908年间的美国对防御性现实主义来说是最容易拿下的案例。然而实际上,外部威胁的稀缺使得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大打折扣。如果外部威胁不存在或者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扎卡利亚所总结的以“威胁”为自变量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就几乎无法发挥作用。正如阿诺德·沃尔弗斯假设的那个场景:着火的房子里大家都忙着往外跑;而在不着火的房子里人们的行为就不可能那么一致。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扎卡利亚承认,防御性现实主义在“国际混乱的时期”,特别是“当一个政府必须为保证其生存和领土完整采取行动的时候”,比较有解释力。但这明显与“对防御现实主义而言,美国绝对安全的地理位置使得不扩张的事例是‘最可能出现的’”的说法相矛盾。在结论中扎卡利亚也承认,在解释一个强国的崛起和随着时代而变化的目标时,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更具有解释力;在相对安全和稳定的时期,当强国能够“奢侈”地选择他们的利益和目标时,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能够更好地解释国家行为。而上述说法又同本书开头所说的“对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而言,美国的扩张事例是‘最不可能出现的’”相矛盾。

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 43.

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文集》(于铁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0页。

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 281页。

同上书,第 62页。

同上书,第 280页。

同上书,第 62页。

因此,扎卡利亚的研究设计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并不完整:在 1865 至 1908 年之间,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自变量——美国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变化极小,而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自变量——国家实力和政府的强弱——变化相当明显。在这 43 年里,美国的周边环境始终是安全的,而国民经济产出、军事实力、政府机构和人口数量都经历了大规模增长。因此有学者建议扎卡利亚补充一个国家实力下降而外部威胁增加,或者国家实力稳定不变而外部威胁变化较大的个案,从而真正实现对两种理论解释力的公平比较。

其次,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本身也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部分学者对扎卡利亚的自变量提出了质疑,肖恩·M·林恩—琼斯(Sean M. Lynn-Jones)认为导致美国在 1865 年到 1908 年之间扩张不足的是政治共识的缺乏而非强大政体的缺失。在他看来,这一阶段立法与行政的对立体现的是社会利益认同的分散,因此很难直接与政府的强弱挂钩。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翰·汤普森(John A. Thompson)则认为,这段时期内美国政府的力量与其对外扩张的程度呈同比增长关系,很难说是前者导致了后者。从全球范围来看,直至 1908 年,美国政府的规模和权威还十分有限,美国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与其经济实力相比也很微不足道。两种状况并存的事实毋庸置疑,但扎卡利亚对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阐述则有待进一步证实。

再者,扎卡利亚对 54 个案例的选择缺乏一定说明。该书用两张表格列出了两个时间段(1865 年到 1889 年之间和 1889 年到 1908 年之间)美国面临的领土扩张机会。但是作者没有阐明表格中的案例是凭何种标准筛选出来的。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困惑的是:一方面,加拿大和墨西哥被列为 1865 至 1889 年间领土扩张的机会,但文本中没有对其进行任何分析;另一方面,作者在文本中讨论了美国在同一时间购买库莱布拉(Culebra)、泰格岛(Tiger Island)、古巴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p. 172.
Ibid., p. 179.

John A. Thompson, "Review: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6, No. 2, 1999, pp. 820—821.

见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 132 页,第 262—263 页。
同上书,第 132 页。

和圣巴泰莱米 (St Barthelemy)等地的计划 ,但上述个案并没有出现在表格中。

此外 ,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似乎缺乏预测能力。该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实力的增长导致扩张 ,但对扩张的性质、手段和规模却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固然没有理论是万能的 ,科学理论必然有其有效的边界。但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国际政治领域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因此如果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不能回答诸如扩张在何种条件下会导致战争或避免战争等问题 ,就不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造成这一遗憾的原因之一是扎卡利亚对扩张的定义过于宽泛。在本书中 ,从增派大使到美西战争都是美国“扩张”的表现 ,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与罗斯福对日俄战争的调停都被算作美国“扩张”的证据。

最后 ,扎卡利亚在结论中对国际政治的前景颇为乐观的预测似乎也存在问题。扎卡利亚认为 ,由于其权力被国际组织、地方权力机构和非政府行为体侵蚀 ,今天的政府不像 150年前那样自主而且强有力 ,因而富国的侵略野心受到了制约。这个从政府型现实主义得出的推论似乎更贴近新自由主义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逻辑。另外 ,这一说法也与扎卡利亚在《自由的未来》中提出的观点相左。在该书中 ,扎卡利亚认为“缺少自由的民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数量剧增 ,而这些国家的领导层全然不顾及国内法律、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约束 ,武断行使行政权力 ,因此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同时 ,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重要一环是工业化导致中央政府力量的增长。那么 ,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其政府力量应当处于上升而非下降势态 ,但这又同扎卡利亚对未来的预测产生了矛盾。

四、结 论

扎卡利亚的《从财富到权力》提出了一种关注政府能力特别是核心决策者所掌握的国家力量的研究模式 ,即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这一理论试图推翻防

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 80 页。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p. 180.

Fareed Z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御性现实主义关于寻求安全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动因的假设,证实“能力塑造意图”的古典现实主义原则,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结构、规模和力量对国家扩张海外政治利益的限制作用。

虽然扎卡利亚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批判和对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建构存在一定疏漏,作者所选择的案例是否具有普遍性也值得进一步探讨,该书仍然称得上是社会科学定性研究的一个范本。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这本书以及围绕其展开的理论探讨充分说明:严谨的社会科学方法虽然无法全面展现历史和人性的复杂,但它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能够透明化、规范化知识更新与知识积累的过程。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本书为我们揭示了衡量国家实力的另一个维度——政府能力。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得到了迅速提升,而且,实力成长中的中国正在寻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尽管一个国家由弱到强已经不大可能像扎卡利亚在该书中讨论的那样走对外领土扩张的道路,但是他从国内政治角度揭示的大国崛起的内在机理,值得我们在思考中国如何平稳而又有效地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时加以借鉴。